

陳旭昇在路上遇到吳聰敏

陳旭昇·吳聰敏

2024/1/29

旭昇：你 [1984年] 回到台大後主要就是教總體，而且一開始也還是專注在總體方面的研究吧？

聰敏：因為我的論文就是跟總體有關嘛。

旭昇：後來是怎麼樣的一個契機，開始去接觸經濟史研究。

聰敏：我認為這個就是要回到科學的概念。我平常也不見得讀很多，但是，有些人的文章我會讀。比如說 Friedman 的東西我會讀，Lucas 的東西我也會讀，他們有時候就會講到什麼是科學，我也就開始注意科學是什麼。¹ 多讀了一些之後，我對於科學的理解就變得比較明確。

科學是說，第一個你觀察現象，第二個你想要去解釋它，而解釋的起點就是你有一些猜測，猜測可能聽起來言之成理，但是到最後你要有證據，你一定要有證據，對。

到了證據這一塊，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這種講求證據的觀念對我來說是慢慢累積成形的，到了後來，你跟我講說你有一個非常偉大的模型，我一點都不 care，對，倒也不是說不 care，我就是說好啊，你講這個故事很好聽，但是你告訴我，這可以解釋現象嗎？你的證據在哪裡？

如果證據能夠符合你的預測（理論）的話，我就說你這個東西是個有趣的東西，如果你說，目前還停留在理論階段的話，我的興趣就會少一點了，大概情況是這個樣子。而經濟史對我來講其實就是一個 empirical study，就是在歷史資料裡挖掘證據，這個你應該可以同意。

旭昇：當然同意。

¹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聰敏：其實就是 time series 的實證研究，經濟史研究是以早期的資料做實證研究。但是我也必須講說，一開始我對這東西有點模糊。我認為我在拿到博士學位時並不懂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學是科學」，我大約是似懂非懂。我現在上課時，也會跟學生講我當時的狀態。後來當然就是在教書的過程中，我花時間持續讀這一個讀那一個，就慢慢的形成我今天對於經濟學的看法。

那研究為什麼會做到經濟史，我剛剛講的一個方向是說，經濟史是實證研究，是要解釋現象。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認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讓我進入到經濟史。我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回到台灣以後，就覺得說如果能夠了解一下台灣可能也不錯。

我可能潛意識裡還有一些過去黨外反對運動的激情在裡面，想要多認識一點台灣。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總體的課程裡講到 hyperinflation 的現象，當時的重點是說，預期心理的改變如何讓惡性通膨停止下來。我回來以後就發現，對，台灣好像也曾經經歷過惡性通膨。對這個現象以前當然也有一些研究，但是資料都不完整。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啊，我就動手去找一下資料來看看，就這樣子。

旭昇：所以某種程度來講，惡性通膨這個議題算是你踏進經濟史的一個起點。

聰敏：對，可以這樣子講，對。但是惡性通膨當然也是總體的一個重要議題啊，在總體經濟學也都會教到啊。

旭昇：對。

聰敏：但是，我一開始也不曉得怎麼做研究，我覺得做研究有一個重要的氛圍是，你有一些人可以跟你討論，對我來講，這是重要的。但是，我那個年代沒有這個東西，我們經濟系沒有這個東西。

旭昇：其實這也是我想問的，因為我1990年才進台大念書，我蠻好奇的是，1980年到1990年那十年之間，台大經濟系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樣貌？

聰敏：可以啊，可以講一下啊。那個老師們的互動，後來有一段時間變差，但是在之前，其實也大家都蠻好的，互動都很好。我們會在經研所大樓三樓一起吃午飯，但是在吃飯的時候，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們很少聊到經濟學的議題。

我有時候會這樣想,如果是在美國,系裡面有一兩個資深的教授,研究做的還不錯,然後像我這樣年輕的菜鳥進來,就跟資深老師聊天。有時候資深老師隨意講兩句話,我這隻菜鳥就會受用很多。

但是,我覺得當我在年輕的階段時,1980年代的台大經濟系沒有這個東西。大概就這樣,我們那時候很多議題還是圍繞在,如何把國民黨扳倒... (笑)。

旭昇: 對啦,我知道那時候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剛好那個時候的社會氛圍,讓學者們會有一種感覺,好像有比學術更值得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有關於社會的這些改革。

聰敏: 對,沒錯,沒錯,那個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很重要,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不是說哪一個重要哪一個不重要,而是說一個人進到一個系,這個系裡面如果有一些 senior faculty (資深教授),重點是他們有持續在做研究。然後,他們隨口講出來的一些觀點,對於年輕的學者有啟發性。

旭昇: 但也許那時候那些 senior faculty 就是希望 junior 也能夠跟著一起來推動這些社會的運動。

聰敏: 這一點沒錯,但這兩個不衝突。OK 我必須這樣講,這樣講也許可能要求太多了,我意思就是說,你是一個 senior faculty,你關心如何把國民黨扳倒,但是同時你也知道說研究是重要的。

有時候談這個東西不一定說要有正式的 meeting,然後我們坐下來來好好談,其實不用,就是我們在隨便聊天,然後你講一個東西,講著講著突然就冒出一句話,這句話可能會啟發我去想,為什麼會有這個觀點?

我要講的是這個,我認為這個跟我們兩個人坐下來正式討論相比,搞不好更重要。但是這個東西齣,除非你一個系的學術水準要到了某個階段,要不然這個東西是出不來的。

舉個例子來說,我剛剛提到,我剛進台大時,對於科學是什麼,其實很模糊。後來讀了 Friedman 與 Lucas 的文章,觀念才清楚。但是,經濟系的老師們,如果有人在閒聊當中,能夠隨口點出來,我覺得我就會受用無窮。

旭昇: 對,不過這也還好啦,畢竟本來我們就一直都是屬於學術研究的邊陲,就是說即使台灣經濟已經邁入已開發國家了,但是某種程度上,在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上我們都還算是發展中的一個 status,還是在發展中啦。

聰敏：對，對，我同意，這個我同意。我們兩個在這個認知上是一樣，這個東西不是說砸錢要它出現就會出現，它事實上是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對。但是我只是說，從我的角度來講，我1984年回到台大經濟系，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如果有個 senior 帶領，或者偶而提點一下，我覺得我很多冤枉路可能可以少走一點。

旭昇：不過我想回到剛才講的那個經濟史研究，好像有人會覺得說當我們在研究台灣的經濟史，無可避免的，就得去回顧一些像是日治時期的殖民經濟體制，不管是政策也好或者措施也好，而好像會有人認為說，做日治時代經濟史研究的，傾向於在美化日本殖民經濟。

聰敏：這個有可能啊，很多人會這樣認為啊。

旭昇：你的看法是？

聰敏：這沒什麼好講的啊，這個就是證據拿出來。

旭昇：Yeah，但是他們的講法有點像是，即使證據拿出來，不管是用什麼方式去衡量那個福利，發現那時候的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下福利確實提升了。可是他們的講法就是說...，不管啦，不管結果如何，即使是福利提升了，但是殖民經濟它就是殖民經濟，沒有什麼好的殖民經濟，還是壞的殖民經濟。

聰敏：我們的課本裡，「殖民」兩個字帶有負面的涵義。但是，在科學研究裡，殖民是指一群人到另一個地方建立了統治政權。負面的涵義是說，在殖民統治下，人民的福利水準下降，但是否如此，必須有證據。事實上，整體人民的福利是上升，還是下降，並不容易衡量。可能是有些人上升，而有些人下降。

另外，上升或下降是要比較的。以日本殖民統治而言，比較的基準是清朝。事實上，我認為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對漢人而言，滿清政府也是殖民統治。如果殖民統治一定是壞的，那麼在日治初期，台灣是從一個壞的殖民統治，進到另一個壞的殖民統治。不過，這不是經濟學研究的觀點。科學的觀點是，清朝是一個制度，日本時期是另一個制度，經濟學家想要了解，哪一個制度對人民較有利。

旭昇：但他們就覺得說，好像是相關的研究會讓人覺得在強調說，某些殖民經濟是好的，或者說你可能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台灣歷經不同的殖

民體制, 從荷治, 清治到日治, 然後你可能在過程中就會做一個好壞的比較等等。

聰敏: 對, 對。這正是科學的精神。

旭昇: 然後就會說, ... 欸 ... 可能我們會認為說, 日治時代的殖民經濟, 至少在一些相關的這些政策或做法上是比清治的時候來的好, 那某種程度上他們就覺得說, 比較好的殖民經濟說穿了它還是殖民經濟。

聰敏: 對, 我知道你在講的,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正是科學研究的起點。你如果一開始就講說殖民統治就是不好的, 那我就想要搞清楚一點, 為什麼殖民統治一定是不好的, 然後, 你要有明確的證據。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在政治的體制之下, 我猜測 — 因為我沒有研究, 我只能猜測 — 政治體制之下的話, 台灣人相對於日本人應該是比較低一階。

旭昇: 對, 有受到歧視, 對。

聰敏: 然後以警察來講, 他們對台灣人應該是比較嚴厲的, 這個我都同意。但是我並不是說這個不重要, 我自己的研究是專注在經濟制度與政策上, 但我同意政治制度也重要。如果有人能夠把殖民統治下的政治參與或是警政制度等研究得很透徹, 那我很開心, 對。

但是今天沒有人能夠懂所有的事情, 我專注的是經濟政策這一塊, 然後一個政策下來, 他到底對台灣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我研究的重點。我剛剛說過, 對漢人而言, 滿清政府是殖民統治, 日本也是殖民統治。日本戰敗投降後, 台灣終於脫離殖民統治, 那麼, 台灣的情況有變好嗎? 沒有。1945到1950的5年期間, 台灣的經濟情況是20世紀最黑暗的5年, 原因是國民政府對台灣實施經濟管制。

我覺得一直糾結在殖民統治是好是壞這一塊, 我認為意義也不大啦。針對政策進行評估, 拿出證據來, 讓證據說話, 我認為比較重要。

旭昇: 了解。余英時好像也提出過類似的概念。他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就是把一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搞清楚, 弄清楚它的前因, 弄清楚它的後果, 以及中間的傳導機制是什麼。²

²「有一個現象, 把這個現象搞清楚,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在這個地方發生。前因是什麼, 後果是什麼, 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就是要瞭解這個真實性」, 李懷宇 (2022), 《余英時訪問記》, 允晨文化, 頁 57。

你最近寫了《台灣經濟400年》這本書，一開始的起心動念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寫書的計劃？

聰敏：哈，我寫書跟我的人生一樣，沒有計劃，不過，退休前幾年，開始出現這個想法。如果要講為什麼要寫書，我的動機倒很清楚，我希望台灣人多了解台灣事。但是，是科學的了解，而不是以訛傳訛。今天在各種媒體上也有不少關於台灣的報導，有些正確，有些錯誤。我希望錯誤的比率能減少，但這需要有研究。

我剛剛不是提到說我從美國回來，然後就想說多了解一下台灣，我知道台灣好像有個惡性通膨，但也是搞不太清楚。後來就花點時間去把資料整理一下，整理完以後就發現，喔！那個物價膨脹跟貨幣供給成長率原來是同向變動，其實就這樣子，但是那時候我不會問說，為什麼貨幣供給成長率會那麼高。

旭昇：其實這就回到我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對整個總體經濟的演進跟脈絡很清楚的話，你大概只會觀察到說貨幣跟物價膨脹有關係，啊！這符合 Milton Friedman 的講法，然後就覺得很開心，可是你不會再回頭更進一步的去想說，那貨幣供給為什麼會增加。

聰敏：沒錯，沒錯，對。那後來當然中間那段時間我也做了一些有的沒的，反正我們那個年代要在學術界 survive 也蠻簡單的，對不對？我常常講，如果我今天在台大經濟系，我絕對存活不了，無法在指定的時間升等。不過，我東看看西看看，似乎有個好處，一方面彌補我在基礎經濟學的不足，另一方面，若我看到某一個資料，我比較有能力聯想到，它事實上是一項重要的證據。

我1992年到芝加哥大學訪問一年，這個對我來講也有點重要。芝加哥大學有一個總圖書館，在五樓有一半的空間收藏非常完整的台灣資料，大概是從1945年開始。當時我除了去聽課，聽 Lucas 的課，然後平常沒事就跑到圖書館，結果我發現一個有趣的資料。話說我在大學的時候，台大圖書館其實不是圖書館，應該叫讀書館，我們都是只是去那邊讀書的，對不對？

旭昇：對。不過讀書讀累了，還是會跑到書庫裡找點其他書翻翻。

聰敏：不過，在我哪個年代，很多書是閉架的，想要進去翻查也不可能。那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有一些過去台灣銀行每年的《年報》，裡面有資產負債表。

旭昇：其實這件事情我也覺得... 這岔題了，但是以前我在 Wisconsin 的時候，那個總圖書館叫 Memorial library，它也是有一整層樓，就全部都是台灣的書籍，那也有一點點來自中國的簡體字書。

中國的部分那時候當然比較少，主要是台灣，對，就像你講的，會有各式各樣的政府統計書，像是主計處或是財政部，甚至是台北市政府的各種月報跟年報啦等等這些相關資料，看了會覺得很驚訝，就是說為什麼這些東西會被寄到美國的大學這裡？

聰敏：那我先講一下。後來我有機會跟那個圖書館負責收藏的人聊了一下，我就發現他們也蠻專業的，所謂專業意思就是說他知道什麼東西是重要的，然後他們想買怎麼樣的資料，這個資訊就會被 pass 到台灣來。好，那台灣有那種叫舊書攤，台灣因為有人知道那邊要買，所以就會去舊書攤收購，但是台灣這些人他不見得很專業，對不對？我猜他可能是說我現在手頭買到什麼東西，問美國的圖書館要不要？如果圖書館說要，他們就寄過去了。舉例來說，我有看到審計部的年報，而《審計部年報》在那個年代事實上是極機密，那極機密的話就是會編號，所以我看到的是編號被塗掉的《審計部年報》。

那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讓我真正體會到，第一次體會什麼叫做圖書館，然後圖書館為何重要。這個對我來講算是有點重要，因為我原來已經找出貨幣供給與物價膨脹率的相關性，圖也都畫出來了，但是不會進一步問貨幣供給為何會增加。在那邊反正有事沒事我就去翻翻，我就慢慢發現說，台銀的資產負債表裡面有一些放款的項目，其中有分成貸放給民營企業，還是貸放給公營企業的。但是，早期台銀基本上沒有放款給民營企業。不過那個看一看，看一看，慢慢那個東西就開始出現了（旭昇：圖像就出現了）。

我是從那個地方開始真正了解戰後的惡性通膨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因為我從美國回來以後，覺得芝加哥大學那邊的資料在台灣不太容易看到，所以我先寫了一篇，那時候是收錄在記念華嚴教授專集，³ 其中就把台銀的放款資料跟之前的惡性通膨的研究連結在一起，隔了一兩年我就寫了一篇解釋為何台銀的放款會大幅增加，背後的原因是來自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管制，整個圖像的拼湊是這樣一步一步來的。但是，我寫到那一邊我就停下來了，停下來的意思就是說，我只寫了

³梁國樹(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記念華嚴教授專集》，1994，台北：時報。

1945到1949年,但是我當時也沒問說,那1950年以後發生什麼事情。沒有問,就不會探究。但是,沒有問的原因應該是我對1950年以後的經濟情勢,可以說一無所知。那這個要隔得非常久,大約是在我開始寫《台灣經濟400年》這本書的時候才慢慢把這部分補起來,所以算是走了蠻長的路。

旭昇: 所以把《台灣經濟400年》這本書放在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脈絡下,其實也可以算是科普化你在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研究內容。要不要談一下你在台灣長期經濟成長方面的研究?

聰敏: 我在1980年代從Rochester畢業的時候,經濟成長的議題已經開始出現了。經濟成長的議題以前當然也有嘛,但是,1980年代的重點,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empirical,而empirical的前提就是要有統計資料。要不然你推導一些有的沒的模型,如果不能驗證,就不曉得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1980年代經濟成長研究的發展方向對我來講非常重要,就是大家開始關心長期GDP的統計。這裡面當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Maddison的長期歷史統計,⁴他就是在做這個東西。但是,我1984年回到台灣之後,並沒有馬上碰經濟成長的議題。到了1992年,我從芝加哥大學回來以後,對於台灣戰後的惡性通膨已經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其實我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東西也很好奇,以前也有研究,讀了一些東西,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比較偏向馬克思的。我對馬克思思想完全不了解,但是,如果有人的想法是偏向馬克思,我不會因此就排斥他的東西,重點是東西要有說服力。我讀了一些左派論述的東西,有一些其實對我來講還蠻有幫助的,其中,矢內原忠雄的作品對我來講是蠻有幫助的。⁵

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提出「資本主義化」的概念。資本主義化指的是日本統治初期的這些基礎建設,對於這個概念矢內原忠雄用了不同的名詞。但因為他是針對台灣當時的狀況進行論述,因此,對我很有啟發。不過,我後來在寫《400年》這本書時我才發現說,其實矢內並沒有講得很完整。例如,他沒有提到日治初期日本人建立公共衛生制度,讓台灣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⁴Angus Maddison (1926–2010), 著名總體經濟學家,長年任教於格羅寧根大學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⁵矢內原忠雄 (1893–1961), 日本經濟學者,曾任東京大學總長 (校長)。

不過，研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就是說，某一個年代你做了某個東西，後來的人就繼續以那個東西為基礎，可能推翻你的講法，但是即使你想法被推翻，這不重要啊，科學的發展就是如此。好，那矢內原忠雄對我是重要的。

矢內原忠雄的著作告訴我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米糖出口的重要性。不過，他的年代並沒有 GDP 統計，因此，我們也不知道 GDP 成長率是多少。但是，1980 年代經濟成長的研究裡，一個重要的議題是亞洲四小龍，台灣是其中之一。亞洲四小龍的特點是高經濟成長率，例如，在 1960-2000 年期間，台灣以 PPP 計算的人均 GDP 成長率大約是 6.5%，全世界排名第一。⁶

我對於以上的背景有大略的了解之後，就開始想，像國民黨這種無惡不作的一個政黨，怎麼可能在戰後讓台灣的經濟成長達到那麼高的成長率。你可以說這樣的想法聽起來有點可笑，但是這確實是我當時心中的疑問。要解答這個疑問，一個可能的想法是，搞不好日本統治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就非常高了，戰後假設有一段時間平均每年 6%，對不對？那我就想說搞不好日本統治時期也就每年 5% 到 6%。如果是這樣的話，高成長是日治時期就開始，戰後只是延續而已。要了解這個想法對或不對，就變成要先去了解一下日本統治時期的 GDP 是怎麼一回事。好，我就開始去看這些，我才發現其實日本人已經做了一些，溝口敏行教授他做了 1903 年到 1938 年的 GDP 估計，後面那一段時間沒有做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 1938 年以後就是戰爭期間，資料變得難以取得。另外，1945 年以後他就不做了，因為他是做殖民地的經濟統計，所以他就沒有處理 1945 年以後的。⁷但是我在研究惡性通膨的時候就發現，1945 年前後那一段對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好像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且是負面的影響，我就想我來把這一段時期補起來。溝口敏行做到 1938 年，我就從 1939 年開始做到 1950 年，然後後面就接上主計處的國民所得統計。不過，溝口敏行是從支出面估計，我是從生產面估計 1905 到 1950 年。

但是，1939 到 1950 年期間的資料非常少，一開始也不曉得要怎麼做，因此，有些部分只能間接推估。這樣的結果當然不很準確。事實上，以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如果要估算工業革命前後的 GDP，也有困難，也必須做間接推

⁶PPP 指的是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也就是說，是以實際的購買力來衡量 GDP 產值。

⁷溝口敏行為日本經濟學者，長期致於估算日本殖民時期台灣與南韓的經濟統計。

估。但是不管怎麼樣，有總比沒有好。所以我就把這段時間的 GDP 估計出來。因為資料本身就是零零落落，所以誤差一定非常大。雖然誤差大，例如可能是加減 10%，但對於了解戰後初期的經濟特質，仍然有幫助。

旭昇：在《台灣經濟 400 年》裡面，你最後有兩個主題，一個在談教育，另一個是在談央行，為什麼最後會有這兩個主題？

聰敏：我一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非常清楚，台灣 400 年來經濟發展的現象是什麼。到了後來，我對於經濟發展的現象已經有所了解。如果不談 17 世紀的東印度公司與鄭氏王朝，清朝時期的台灣是一個停滯的傳統農業經濟。日治初期，台灣的現代經濟成長啟動，但是，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經濟又陷入停滯，一直到了 1960 年，台灣才出現高成長。

經濟學家的工作是解釋經濟現象，所以我們如何解釋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從清末的停滯變成日治時期的成長，然後又在戰後陷入停滯，而在 1960 年開始出現高成長？我事實上是在幾年前才了解，台灣戰後高成長的出現，關鍵的因素是美援把台灣的管制經濟體制轉型成為市場經濟體制。這個要感謝美援。

不過，日治時期，台灣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制，有不錯的成長率，那為何 1945-1960 年期間陷入停滯？我後來才知道，原因是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台灣被改變成一個管制經濟。

但是，美援並沒有全面地改變台灣的管制經濟體制，事實上，財經官員仍然維持原來的經濟管制的思維。一直到今天，管制的思維仍然揮之不去，其中，教育管制與台灣央行的管制政策是兩個例子，事實上，我認為是影響最重大的兩項管制。所謂影響最重大，意思是說，後果最嚴重。

其實我有個困惑，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為什麼管制的思想那麼濃厚？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旭昇：可是如果你問我，我大概可以想像，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價格管制。政府透過管制價格可以讓民眾有一種被照顧的感覺。為了討好選民，怕選票流失，政府當然就會更努力的去管制價格。

聰敏：我同意，但我的問題有一點不一樣。我的意思是，應該很少人知道，清朝的官員的思維是，經濟發展並非官員的責任，這很明顯地表現在很多政策上。那我的問題應該是這樣，就是說 1895 年之前，你看清朝的政府也要

收稅,但是他腦海裡面並沒有那種思考說,如果政府能夠發揮某些重要的功能,比如說保障財產權,則經濟可以成長,而政府稅收即可增加。

清朝的官員完全沒有經濟發展的思維,好,那為什麼清朝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有些財經官員的觀念已轉變成,政府在經濟發展裡有重要角色?但是,到了這時候,財經官員是認為,管制才能促進經濟成長。到底這些官員去哪裡學到這些東西?

旭昇:我想這是不是涉及到所謂的計劃經濟,畢竟管制是來自於計劃經濟的延伸嘛,對不對?

聰敏:有可能。1959年底,美援駐華合作分署長 Haraldson 提出(八點財經措施)時,其中一點就是,油電價格管制要拿掉。他說油電價格不應該由政府決定,而是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公用事業委員會來決定。另外,他也說公營銀行必須要民營化。但是,以上兩個建議,國民政府都沒有接受。一直到今天,油電的價格還是由經濟部決定,而且,油電經常凍漲,凍漲就是價格管制。而公營銀行則是換湯不換藥,名稱變成公股銀行。

旭昇:我覺得要改變管制思維並不容易。

聰敏:非常困難。沒錯,所以值得想一下的是,很難改變的原因是什麼?你剛剛說,政府的價格管制可能受到民眾歡迎,因此能獲得選票,我大概也同意。但是,我們必須用實際的例子來看才能講清楚。今年(2023年)上半年的蛋價管制對小蛋農造成嚴重傷害,蛋農不可能歡迎這個政策,應該是說,反對都來不及。一般民眾呢?其實我不太會判斷。

有一段時間,蛋價管制使蛋商不願意把雞蛋賣到都會區來,造成所謂的「蛋荒」,超市裡放雞蛋的架子上空空如也。我當時還到超市拍了幾張照片。我認為如果民眾了解「蛋荒」背後的真正原因,他們應該不會歡迎蛋價管制。我的意思是說,大部分的人應該願意多花一點錢買雞蛋,當然,也有一些人會被迫減少消費。

那麼,為何會出現蛋荒?蛋荒的原因是因為產量減少,主要是因為禽流感。其實不只是台灣,美國也因為禽流感而造成產量減少。但是,美國沒有管制蛋價,因此,蛋價大幅上漲。蛋價上漲後,願付價格較高的人,仍然買原先的數量,願付價格較低的人,會少吃一些蛋。少吃一些蛋是世界末日嗎?當然不是,市場上有很多蛋的替代品。我看了一篇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報導,才知道美國有一些消費者少買蛋,多買一些鷹嘴豆與酪梨,這

兩樣都是蛋的替代品。

台灣農委會的對策是管制蛋價，問題是，價格管制不能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那你農委會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有些官員把價格上漲歸咎於「蛋蟲」作祟，媒體也附和這個說法。因此，民眾被誤導成，蛋荒是奸商造成的，而農委會的管制是要來「糾正」不良的蛋商。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民眾了解蛋價管制的來龍去脈，他們真的還會歡迎價格管制嗎？我不是那麼確定。

旭昇：價格管制不會增加產量，也不會有效果...

聰敏：是啊，雞蛋產量減少是因為禽流感，價格管制不能使產量增加啊，當然沒有效果，哪有可能？另一個例子是，台灣的夏天如果有颱風來，菜價會上漲，原因是產量減少。以前，官員還會說要查價等等的，問題是，查價也不可能使產量增加啊，產量增加是要菜農與蛋農增產才有可能啊。

有些人把蛋荒歸咎於蛋商囤積，官員並煞有介事地派員監控價格。這與清朝末期，地方官員把月蝕的現象視為是月亮生病差不多是一樣的。

旭昇：什麼意思？

聰敏：我在《台灣經濟400年》裡講了兩段紀錄，一次是在嘉義，另外一次是在宜蘭。清朝末年，月蝕被視為月亮生病，或者是受到天狗的破壞。月蝕出現時，地方官員很快到了廣場，膜拜祈禱，民眾則敲鑼打鼓，過了不久，月亮終於又完整無缺地露臉了，地方官員完成拯救月亮的任務，鬆了一口氣，民眾也開心地離開。到了21世紀，可能還是有人相信月蝕是月亮生病，但比率非常低，這個改變我認為是自然科學教育的勝利。

回到今天，菜價與蛋價上漲時，官員煞有介事地查價等等，一段時間後，菜價與蛋價回到正常水準，官員與媒體就把它解讀為價格管制與查價有效。這跟敲鑼打鼓拯救了月亮基本上並無兩樣的。以經濟學的概念來說，這是把相關性誤認為是因果關係。

旭昇：月蝕出現時，民眾敲鑼打鼓沒有其他副作用，說不定讓大家趁機運動一下，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價格管制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有副作用...

聰敏：對！你說的對。價格管制創造另一個問題，買東西要靠一點本事，或者說特權。譬如說，你可能需要透過長時間排隊的方式購買商品，耗費的時間

成本其實也是另一種價格。或者是靠賄賂才能買到商品，這衍生經濟學中的競租 (rent seeking) 問題。

旭昇：不過，另一種支持價格管制的說法是，價格管制可以照顧到低所得的家庭...

聰敏：這有可能，但是，所得高的家庭受益更多。以油電凍漲而言，所有民眾的電價都下降，但有錢人與企業用電較多，因此，受益較多的是有錢人與企業。這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油電凍漲是以納稅人的錢補貼有錢人與企業。如果把這些錢省下來，對窮人提供較多的補貼，不是更能達到目標嗎？另一個價格管制例子，現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台灣的學費管制政策其實是在補貼有錢人，因為台成清交的學生多數來自所得較高的家庭。

那麼，農委會管制蛋價的政策，窮人是否真的受益？我很懷疑。今年三四月的蛋荒時，我在新北市買不到蛋，但當時中南部仍然有蛋可買，我一個學生住在桃園，也買得到。不過，價格比官方管制的價格高一些。我花了一點研究才了解，台北買不到蛋的原因是，蛋商把蛋運到其他地區去了。事實上，雙北市願意多付一點錢買蛋的人很多，但是蛋商如果把蛋送到雙北，並且價格抬高一些，會引起注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蛋商就把蛋運往願付價格高一點，而且媒體不會注意的地方去。

旭昇：但是大家還是很愛管制政策啊！

聰敏：沒錯，我認為很多人可能還是覺得價格上漲時，政府應該要管一下。農委會主委因為這次的蛋荒事件下台了，但是贊成農委會主委應該下台的人，可能有很多人的理由不是反對價格管制，反而是認為他沒有把價格管制的工作做好。事實上，我猜很多人不知道蛋荒是管制的結果。我自己一開始也不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後來花了一點時間，才了解其中原因。

我後來也跟一些朋友聊過，其中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大部分的人都不曉得蛋荒的前因後果。既然不曉得前因後果，當媒體說蛋荒是因為蛋商哄抬，大部分的人也就接受。那媒體記者為何相信「蛋商哄抬」的故事？台灣大多數的媒體記者沒有時間，可能也沒有能力，針對特定議題去做專業報導。結果是，既然大家都這麼說，我也就這樣報導。

旭昇：這種不明就裡的狀況似乎是一再發生，很難改變。

聰敏：真的很困難。如果民眾相信價格上漲是哄抬的結果，當他看到任何東西

的價格上漲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廠商哄抬」。問題是，廠商是否哄抬，很難驗證。反過來說，如果民眾了解價格機能的運作，當他看到東西的價格上漲時，第一個反應可能是需求增加或供給減少，而需求增加或供給減少事實上是很容易驗證的。颱風來襲會讓蔬菜的供給減少，禽流感也會造成雞蛋的供給減少，因此，颱風會造成蔬菜價格上升，而禽流感會造成雞蛋價格上升。一旦他能理解以上的推論，他就比較不會全盤接受「廠商哄抬」的解釋。

旭昇：所以這樣的困境到底要如何突破啊？事實上這些都是經濟議題，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我們到底能夠做點什麼？

聰敏：我覺得改變的一個可能性是經濟學教育。我在最近改版的《經濟學原理》裡面特別加了一章，仔細討論討論三個價格管制，雞蛋，口罩，與油電凍漲。台灣的經濟書教科書，內容大多模倣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最前面的幾章分析市場機能的觀念，但是談完市場機能後，通常接著就講外部性。模倣美國的教科書的做法並無問題，問題是出在，美國可能是全世界物價管制最少的國家。你在美國問一個美國人說蛋價要不要管制？他會反問你，蛋價為什麼要管制？

但是，你在台灣問一個人說，蛋價上漲，政府要不要出面管一下，可能有不少人回答，管一下比較好。你問他為什麼？最常見的答案是，蛋價上漲是因為蛋商囤積與哄抬，如果你再問他，你有證據嗎？他可能回你，「一直都是這樣子的啊！」

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也會分析價格管制的弊病，但篇幅相對較少，很多說明是點到為止。我的猜測是，美國民眾對於市場如何運作，以及價格是由供需均衡所決定的，了解比較透徹。因此，教科書不需要花太多的篇幅在價格管制的議題上。但是，台灣的教科書如果也只花少許的篇幅在價格管制上，民眾「價格要管一下」的思維不會改變。

我在《台灣經濟400年》的最後兩章講了教育管制與央行，也是同樣的動機。

旭昇：了解，下次我們就來談談央行以及貨幣政策。